

学习陶行知勇于改革教育的创新精神

吕长春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指出：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具有这两种要素之一的人，才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人物。他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陶行知的一生就是按照他自己所提倡的这种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改革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地奋斗的。

陶行知在教育事业上的改革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是反传统教育、反洋化教育的旗手。”（林伯渠语）。他坚决反对那种只是“乞灵古人”、“沿袭陈法”的旧教育，尖锐地指出传统教育是教人“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教人脱离生活实际，教人脱离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教学生吃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一批一批有用青年教成一批批废人。他讽刺某些沿袭陈法的“泥古”专家们，“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①为了要冲破这些枷锁，他大声疾呼要取消“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教学生吃别人”的“小众教育”，要大力开创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由人民自己创办管理的、适合穷国国情的“大众教育”。他又坚决反对那种崇洋媚外、一味“仪型他国”的洋化教育，他辩证地指出：“中外情况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故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中国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在在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②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适合中国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穷国的国情，要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需要把教育、科学向工农大众及其子女普及。要使教育成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的工具。他一生在教育事业上的探索、实践、创新和改革，直到形成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系统的观点，都是按照上述这个方向努力前进的。

由于陶行知自觉地把教育改革事业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他在教育事业上的创新和改革都是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的。随着每一个不同时期政治形势的演变，他的教育改革也就不断地有所发展。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奔波各地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试图唤醒人民中最大多数、最不幸的农人们的觉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一二八”事变后，他看到日寇野心勃勃，侵略火焰有进一步在上海漫延之势，他就率领一批青年教师在上海西郊办学并推广普及教育运动，以提高上海工人与居民、农民的觉悟和增进文化科学知识，为即将来到的抗战作些准备。一九三五年国难加深，“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他立即组织一大批教师及全国各界人士奋起救国，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他身在海外宣传抗日。

①② 《陶行知文集》第10页，第11页。

由他的同道者，体承他的意志，倡导了战时教育运动，以适应战争的现实，以后为配合“全面抗战”，遂又改为“全面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要求蒋介石开放民主，团结抗日。他就以民主教育运动呼唤、发动人民起来争取民主权利，争当名符其实的国家主人。由此可见，他开展的各种教育运动其总目的是为着改变旧中国在经济上的贫穷，文化上的落后，改变旧中国在政治上的腐败黑暗，用以唤起大众，与帝国主义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拯救民族，改造社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他认为宇宙在动，世界在动，人生在动，教育怎能不动？社会是运动的，教育者亦要动。为了要使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联系，他提出必须使教育继续不断的改，继续不断的进。他在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势下，就这样在教育战线上不断的照亮着人民的心。故此，人民群众对他的评价是：陶先生是被压迫下的大众教育的灯塔。

陶行知先生通过不断实践，根据教育本身的规律，综合中外教育理论之长，总结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更是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抛弃了一切陈腐的学说，使教育无拘无束、活生生地实现于人类生活之中，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认识到社会的一切财富全是劳动群众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就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知识来的，因此，他大胆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学说。他竭力反对士大夫阶级所崇尚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陈腐观念，而提倡“在劳力上劳心”和“手脑并用”的主张。为了让更多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他开创了“小先生制”，提倡“即知即传”，还提出了用“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原则来组织劳苦大众自己办“工学团”式的学校，取得求学的权利。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从本质上看是与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相一致的，是与马列主义教育观息息相通的，应该说是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组成部分。正如徐特立说的：“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①陆定一曾代表中共中央说：“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和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原理，并把它实现。”

陶行知在创办育才学校时就提出要办知情意合一的教育。他说：“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向，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②。

陶行知反对先生讲、学生听（记、背）的传统教授法，首创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法。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③以后他又在《创造宣言》中更明确地指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亦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这篇《创造宣言》问世后鼓励了育才学校处于停滞在教学“高原期”的状态的师生，继续飞跃前进，一批十四五岁的少年学生们，出现了“创造热。”他们的创造成绩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金仲华等的赞扬。

① 《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第9页。

② 《陶行知文集》第669页。

③ 《陶行知文集》第13页。

陶行知认为创造的教育必须要解放学生的头脑，让他们敢想、会想、会考虑分析问题；要解放学生的双手，让他们去创造、使用工具与机器，动手学文用武；要解放学生的嘴，让他们多说、多问，有言论自由，又培养了表达能力；要解放学生的空间，让他们去了解社会，接触大自然，搜集丰富的资料；要解放学生的眼睛，让他们除去封建的、崇洋的有色眼镜，自由的看清事实；还要解放学生的时间，学校的课程不能排的太挤太紧，不能无休止的考试，压得学生没有时间思考研究问题和看参考书，而使学学生失去自由学习的机会。陶先生所提倡的“六大解放”是培养创造性儿童的教育计划中不可缺一的。此外，陶校长还提出尽可能的给予学生以充分的营养，因为这是增长体力、脑力的物质基础；还要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一定能战胜困难的信念，要使学生认识并学好语文、教学、外语和科学思考方法论这四门基础课，因为它们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基础工具知识。陶行知认为只有认真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让学生根据各人的兴趣、爱好、特长，尽情地汲取知识信息，才能够在不同的专业上有所发挥。以上这些都是陶行知在培养人才的教育计划中所通盘考虑的几个方面，并随时按照实践的结果加以修正，以达到计划的逐步完善。

陶行知是苦难儿童的园丁，他为了要培养出一批开拓性的、有创造力的人才而煞费苦心。他废弃了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开辟了启发诱导的教学途径。他主张教学不能仅靠老师灌输知识，而要培养学生自己去闯进知识大门。老师的作用是启发、提示、诱导、指引，而学生则应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会学习文化知识的方法，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专业学习中陶先生特别注意学生自动力（自觉的行动）的培养，不论治学、治事都要有自觉的行动。在自觉学习上陶先生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迷”、“悟”、“爱”^①三字的学习三步曲，反对苦学苦练的说法，他认为学生学习一门专业，如果感到很苦，那肯定学不好，学一门专业必须要“迷”进去，孩子们是有这种迷的天性的；再通过老师的启发诱导，使孩子们对这门学科取得更深的了解和更广的认识，这就是“悟”；在不断的提高认识，得到几个飞跃后，孩子们就更“爱”上这门学科了，最终必然以此所爱学科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为人民服务，这是更高级自觉的“爱”。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孩子们始终处于乐趣之中奋进。为了让学生学好专业，陶行知提出“五路探讨”的好方法，即（一）体验；（二）看书；（三）求师；（四）访友；（五）思考。同时他又交给全体学生六个字：“一”，就是在治学上首先要做到专一，有了一个专一的课题做中心，从事研究，便可旁征博引，自然而然的广博起来；“疑”，就是提出疑问，以备研究，“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要培养会问的能力；“集”，就是在研究问题时必须多多搜集材料；“钻”，做学问必须深入的钻进去，探索学问的根源奥妙与诀窍，必有很好的收获；“剖”，是分析解剖，掌握了大量材料，必须分析解剖，鉴别真伪，决定取舍；“韧”，就是坚韧，做学问是一种长期工作，必须有韧性才能战胜重重困难，步入新境。陶先生为了不使学生在学习上有所偏废，特别提出“每日四问”，要学生每天问问自己：身体有没有进步？学问有没有进步？工作有没有进步？道德有没有进步？很明显他是要把学生都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工作能力的人才。事实证明，在他的精心培育下，育才学生能做到“先生不在学如在”，^②每个学生除了学好基础知识以外，都有自己的专业学科，在学校时，没有一个掉队的，进入社会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的确都发出了倍增的光和热。

① 《陶行知文集》第713页。

② 《陶行知文集》第443页。

陶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在政治上一贯的追求真理，在业务上是博学多才，他是一个富有高度进取精神的人。

陶行知起先信奉的是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还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认为中国落后就在于文化落后。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在教育实践中他亲身体会到他所办的乡村教育只有共产党和一些思想进步的或贫苦知识分子支持，他亲眼看到地下党支持的晓庄师生的革命活动被残酷镇压，师生遭血腥屠杀，他辛勤倡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被无辜封闭，连他本人也被无理通缉。血的现实逼着他认真思考，他的思想开始大转变，认识到只有与共产党亲密合作，才能为中国劳苦大众办好教育事业。从此，他在政治上坚定地跟共产党走。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从理论上武装了自己。“一二九”运动后他旗帜鲜明地把自己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更积极地投入“救亡图存”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在白区，共产党面临被破坏殆尽的日子里，陶行知和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等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异军突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世界观，为革命立了大功。”由此可见，陶行知在政治上是逐渐摆脱旧民主主义思想而通过实践扎扎实实地自觉地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一文中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各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幸福。”陶先生就是这样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在死亡威胁的面前他更是大义凛然，振臂高呼，要号召更多的人成为民主战士，继续为民主而奋斗，他在“遗书”上写着：“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个人。”他为民主而战斗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

陆定一在陶行知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致“悼词”中说道：“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道路。”周恩来说：“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①

陶行知先生逝世的地方

上海徐家汇附近的余庆路爱棠新村（今余庆新村）十三号，是一座幽静的庭院。1946年7月25日中午，陶行知先生在这里溘然长逝。

这所房子当时并不是陶行知先生自己的住宅，而是大孚出版公司周宗琼、任宗德的寓所。

1945年春，陶行知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出面邀集周宗琼、周竹安、翦伯赞、任宗德、沙千里等创建大孚出版公司。一旦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遭到反动派的封闭，大孚可以出来接替这三家书店的工作，继续与敌人进行文化斗争。大孚建立时，总编辑即由陶行知担任，翦伯赞、周竹安等为编辑，周宗琼为总经理（沙千里也任过总经理）。

1946年6月，大孚在山东路开业时，他亲自题字，有关事务他常和沙千里、翦伯赞、任宗德商于爱棠新村。爱棠新村十三号当时也兼作大孚办公处之一。

李公朴、闻一多被暗害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为防不测，他遂迁居爱棠新村十三号。7月25日，他患脑溢血逝世。行知先生逝世后，大孚全部迁入了爱棠新村办公。此后翦老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继任大孚总编辑。在陶行知总编辑隐蔽与逝世的地方，大孚同人不由触景生情，怀念之情油然而生，翦老与周宗琼遂决定赶排陶先生临终前一天亲自编定的历史诗作。这便是翌年春推出的《行知诗歌集》。

（王大象）

^① 《周恩来选集》第238页。